



自己以研究经济为职业，当然知道搞市场经济容易出现贫富差距。我曾在本专栏撰文说过，贫富差距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除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再一项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与照顾穷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如是说，我也是这样看。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中央提出扶贫攻坚我举双手拥护。既然自己拥护为何还写文章？其实，我作此文并不是讨论要不要扶贫，而是应该怎样扶贫。这样说吧，前些日子我在西南地区调研，了解到一些情况令我困惑，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思之再三，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困惑与思考写出来。

为便于讨论，让我先说自己的困惑。下面的三个案例是真人真事，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这里将真实姓名、地址隐去。对事不对人，也请读者勿对号入座。

案例一：某村东、西两头住着两户人家，村东那家男主人外出务工多年，前年用务工收入在县城买了套房子，可没钱装修至今未能入住。村西那家男主人这些年一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去年底他家却被确定为贫困户，政府给他买了房子，还做了装

修。东头的那家于是觉得不公平。质问县干部：扶贫到底是鼓励勤劳还是鼓励懒惰？

案例二：某乡有两人是堂兄弟，堂兄遵守国家计生政策，只生一个孩子，加上夫妻俩勤俭持家，生活温饱无虞。而堂弟却违反国家计生政策，一气生了四个孩子，由于负担重，生活非常拮据。年初堂弟被确定为扶贫对象后，政府给钱给物，一下子日子过得比堂兄家还滋润。于是村里人议论：这样扶贫岂不是鼓励违反国家政策？

案例三：某老人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皆有固定收入，而且都在县城买了房。五年前，三个儿子已将老人接到县城同住。可当地扶贫政策出台后，为享受扶贫政策，三个儿子又将老人送回乡下。由于乡下房子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一次上面派人检

查，看到老人住着破房子而未被列入扶贫对象，于是立即责令当地政府整改。有人问：这不是要鼓励人们争当贫困户吗？

不知读者对上面的案例怎么看，我自己是很困惑。后来我到六盘水，把这三个案例也对市委书记周荣讲了，并问六盘水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况。周荣答：六盘水不存在。对此回答我半信半疑。心里暗想：别的地方存在，六盘水为何会不存在？不过四天走访下来，我相信周荣说的是真话。

原来，六盘水的扶贫与别处确实不同。不是贫困户需要什么政府就给什么，而是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简称“三变”）帮助贫困户脱贫。前篇文章我对“三变”改革的要义作过分析，这里不重复。我要指出的是，通过“三

扶贫当从供给侧发力

□ 王东京

变”改革扶贫，着力点是在供给侧而不是在需求侧。着力点不同，扶贫效果当然会不同。

顾名思义，从需求侧扶贫，针对的是消费需求。比如贫困户缺房子，政府就提供房子；贫困户缺粮食，政府就提供粮食。这种做法，学界通常称之为“输血型”扶贫。事实上，上面列举的案例，就与这种“输血型”的扶贫方式有关。读者想想，如果贫困户缺什么政府就能给什么，能坐享其成，人们怎会不争当贫困户呢？

与需求侧扶贫不同，供给侧扶贫是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立足于“造血”。以六盘水为例，政府主要做三件事：一是为农民的资产确权；二是通过“平台公司”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农民的资产升值；三是引导农民入股龙头企业，通过规模经营增加农民的资产性收入。不到四年，有22万

人脱贫却未发生不公平的案例，我想原因即在于此。

由此见，扶贫的思路不同，结果大不一样。事实上，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些年学界一直有争论：有人主张“效率优先”；有人主张“公平优先”。而六盘水的经验证明，公平与效率并非截然对立，处理得好，效率不仅不妨碍公平，相反可以促进公平。我推崇六盘水的做法，是因为他们将公平与效率结合得好，具有面上的推广价值。

说远一点吧。从源头追溯，较早主张“以效率促公平”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观点，政府照顾穷人不应养懒汉，应鼓励穷人自己创造收入。为此他提出了以“负所得税”形式补贴穷人的方案：政府补贴＝收入保障线－（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税率）。遗憾的是，此方

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去产能、去杠杆

□ 刘 瑶 张 明

目前，去产能、去杠杆的成效比较明显，具体表现为：第一，去产能力度加大。截至2017年5月，全国共退出钢铁产能3170万吨，占到年度任务的63.4%；共退出煤炭产能6897万吨，占到年度任务的46%。第二，去杠杆步调加快。一是针对金融部门，央行限制逆回购及流动性操作工具MLF、SLO、SLF的规模，开启“中国式缩表”，并将表外理财纳入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同时，银监会严禁银行资金借助各种通道加杠杆；二是针对政府部门，通过积极发展PPP、资产证券化等新型融资模式，化解债务存量，降低地方政府信用风险。

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中政策之间如果缺乏协调，可能会导致潜在金融风险聚集，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前景。

去产能过急的潜在风险。去产能不等于“去产量”。去产能的初衷是去掉低端、无效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产能利用效率，以此来平衡市场供求关系。过于行政化、刚性的去产能可能导致以下风险。

造成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去产能涉及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且以国有企业为主，从企业结构来看，这些产能过剩的国企属于上游企业，垄断程度较大。而下游企业则多为民营企业为主，竞争相对较为充分。去产能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推升煤炭、钢铁原材料的价格，提高中下游企业要素供应成本。中

下游企业由于普遍缺乏抗风险能力与强大的议价能力，其利润受到层层挤压。如果去产能的措施过于行政化，这不仅会挤出上中游民营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且会加重中下游企业的利润压力，甚至导致部分民营企业退出市场。

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加剧资金“脱实向虚”。从地区分布来看，过剩产能主要分布于东北、华北等地区，这些省份的经济支柱往往是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在并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去产能与保增长的目标之间通常存在冲突。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去产能可能导致更多的资金脱离实体经济，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金融行业与影子银行体系。

去杠杆过快的潜在风险。我国不同部门面临不同的杠杆率。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政府、居民、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本部门负债占GDP的比率）分别为46%、51%与141%，在全球范围内属于中游水平。总体而言，企业与居民部门杠杆率近年来呈现快速趋势，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问题尤为严重。然而，有关决策部门在加紧出台、落实去杠杆的相关政策时，也应充分考虑政策的溢出风险。

缺乏前瞻性与协调性的去杠杆可能导致以下风险：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在货币政策趋紧的当下，市场流动性不足，缺乏前瞻性的去杠杆会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上升，并经由货币市场向债券市场传导，引起债券市场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这会导致实体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困难。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压力又会大于大型国有企业。事实上，从2016年底起，一行三会加强金融监管的举动首先导致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利率攀升，进而传递到实体企业融资成本。2016年底至2017年5月底，票据融资成本已经上升了200个基点。考虑到票据融资是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来源之一，票据融资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民营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此外，2017年2月至5月，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负增长，这是自1997年该数据发布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这意味着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显著下降。

加重中小金融机构经营压力。以银行业为例，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相比，中小银行短期融资占比更高、不良资产比例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加薄弱。在央行和银监会双管齐下加强监管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同业融资—委外投资—标准化金融产品”的空转模式遭受明显打击。在存贷款利差日益缩小，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不断攀升的形势下，中小金融机构步履维艰，且同业存单已经成为风险汇聚点。在2016年，对某些中小金融机构而言，同业融资已经占到新增负债的1/3以上，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已经由去年下半年的3%以下上升至目前的5%左右，这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负债端融资成本的显著上升，再加上MPA考核的实施，某些经营较为激进的城商行、农商行未来将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

资产价格过猛下跌。监管部门密集出台监管政策，金融机构忙于自查自纠，金融市场也易因适应性预期引起资产价格下行。例如，缺乏前瞻性的去杠杆可能导致金融机构抛售金融资产、造成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反过来，金融资

产大幅下跌又会导致金融机构面临亏损，从而不得不启动新一轮去杠杆。事实上，过去几年以来，金融机构通过同业业务层层加杠杆并投资于资产市场。如果应对不当，中国金融市场也可能面临美国次贷危机过程中的“资产价格下跌—金融机构被迫去杠杆”的恶性循环。

可能加剧新一轮资本外逃。在一行三会集体加大马力去杠杆的同时，金融风险一旦快速释放，可能导致市场出现恐慌情绪，从而使得居民与企业部门的避险情绪显著加强，转而有更强的动机去配置海外资产，这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出，从而不利于金融稳定。2014年第二季度至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2个季度面临持续的资本外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因此而面临贬值压力。金融风险的快速显性化将会加剧资本外流与本土贬值压力。

如何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风险快速显性化的今天，潜在金融风险之所以并未爆发，主要由于以下缓冲器的作用：一是居民部门的高储蓄；二是政府部门的综合债务水平较低；三是对外部门的高外汇储备。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些缓冲器的效应正在递减。去产能、去杠杆旨在防风险，同时也应努力避免过快、过于机械地去产能、去杠杆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造成的负面风险。

注重实体部门改革与金融部门监管的联动，通过促进国内结构性改革来化解金融风险。“脱虚”未必“向实”，在实体部门低收益的情况下，仅仅依靠金融部门去杠杆、倒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只有实现实体经济结构性改革与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彼此联动，各种政策间注重协调配合，才能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性作用，实现化解金融风险的初衷。要真正改变金融空转与脱实向虚，必须通过加速结构性改革来提振实体经济回报率，这才是化解金融风险与提振潜在经济增速的正道。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企高负债仍是企业部门高杠杆率的重要来源。应该努力改变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应该大力推进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去产能与去杠杆的过程中要敢于直面僵尸企业的难题。

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外汇储备仍是我国对外部门的重要减震器，资本账户管制仍是我国金融安全的关键防火墙。要防止过早、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的大规模资本外流，防止外部风险给国内经济造成不利冲击。

避免通过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做法。目前中国居民部门的真实杠杆率已经不低，继续加杠杆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例如资产价格泡沫上涨或者居民消费意愿下降等。中国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通过建立长效机制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风险，以避免房地产价格显著下跌可能对居民财富与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冲击。

宏观观察

（上接1版）

（三）主动进取的创新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以改革者和开拓者的魄力，回应时代呼唤，响应人民诉求，把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有机统一起来，在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成果积累的深厚基础上，提出许多前人未曾提出过的新思想，引领中国外交开展许多前人未曾进行过的新实践，使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焕发出现代化光芒，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四）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习近平总书记以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气度，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强调中国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中国将在力所能及和范围内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中国作用，越来越多的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汇聚成国际行动，越来越多的中国机遇为世界各国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的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锐意进取、砥砺前行，在世界乱象中维护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国际变局中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成功走出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之路，谱写了外交工作新篇章。

（一）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展中国实践。我们积极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习近平总书记同奥巴马多次会晤，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重要成果。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后，习近平总书记同特朗普总统成功举行海湖庄园和汉堡会晤，明确了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和原则，实现两国关系平稳过渡。中俄高层交往频密，战略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欧共同致力于建设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我国同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迈上新台阶。

开创周边睦邻友好合作新局面。党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对周边外交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我国秉

持亲诚惠容理念，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从“成长期”迈向“成熟期”。我国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南亚国家合作显著增强。

推动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和中非“十大合作计划”，把中非合作推向新高度。我国同阿拉伯国家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同太平洋建交岛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拉美国家共同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建立中拉论坛，实现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全覆盖。

（二）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挥中国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下，我国演绎了参与全球治理的精彩“三部曲”，通过成功举办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和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引领了亚太区域合作、G20转型进程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为充满不确定性和忧虑情绪的国际社会注入来自中国的强大正能量。我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国际话语权 and 影响力不断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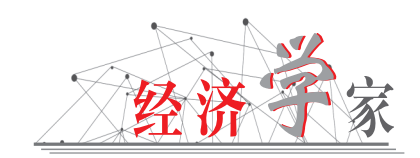
（三）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在各参与方共同努力下，日益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各方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成功落地。我国与许多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对接，2014年至2016年，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今年5月，我国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1600多名代表出席，取得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合作成果，形成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合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磅礴气势。各方盛赞“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谋求动力，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提振信心，凸显中国倡议、全球响应、世界共赢的积极成效。

（四）为解决国际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我国成功举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活动，发

案只是个理论原理，而且只写在教科书里，美国从未实施过。

实不相瞒，我之前一直有个疑问：六盘水官员未必知道弗里德曼，可他们怎会想到以效率促公平？而且在操作上他们提出的“三变”比“弗氏方案”还更胜一筹？周荣告诉我，六盘水四个县、市、区，其中三个是国家级贫困县，从供给侧搞“三变”是被逼出来的。说的也是，怎么想到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没有做而六盘水做了，而且做得精彩，所以我们要为他们鼓掌！

读者不要误会，我主张扶贫从供给侧发力，并非完全不能从需求侧扶贫。比如对孤寡老人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当然要从需求侧予以补助；对那些勤奋劳动，但由于特殊原因致贫的家庭，也应从需求侧给予照顾。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对那些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的人，政府只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切不可顾此失彼，造成新的不公平。



出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捍卫世界和平的时代强音。坚定致力于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努力发挥弥合分歧、劝和促谈的建设性作用。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提出“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为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推动重启接触对话、维护地区和平安宁作出重要贡献。积极参与阿富汗、伊朗核、叙利亚、南苏丹等问题解决进程，同各国合力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等全球性挑战，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五）为维护中国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展现中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问题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法的基础上开展了坚定有力的维权斗争。钓鱼岛问题上坚持原则，充分展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有理有据地回击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坚持通过直接当事方对话谈判解决具体争议，维护了南海局势总体稳定。旗帜鲜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图谋，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扎实开展涉藏、涉疆外交，加强打击“三股势力”国际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积极同国际社会开展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取得重要成果。

我们秉持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优良传统，率先驰援非洲埃博拉疫区及周边国家，宣布建立10亿美元的联合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及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推动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率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思想引领方向，实干铸就辉煌。外交战线全体同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